

王造時的悲劇

從「君子」到「右派」

●黃鶴（大陸旅美加作家）

民族英雄愛國志士

一九三二年「九·一八」事變後，全國民衆的抗日救亡運動不斷高漲，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。救國會成立後進行了大量的活動，推動了全國的抗日救國運動。由於救國會的活動和主張得到了共產黨的支持，引起了當局嫉恨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夜，上海市公安局派出八個特務小組，分別到救國會負責人沈鈞儒、鄒韜奮、李公樸、史良、章乃器、王造時、沙千里和陶行知的家裡進行搜捕，除陶行知因公出國，參加教學會議未被抓到外，沈鈞儒等七人被捕，被帶到租界捕房，不久被移送到上海市公安局。十二月四日，又被武裝押解到蘇州江蘇省高等法院看守所收押，這就是轟動一時的「七君子」事件。

「七君子」事件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，在他們繫獄的八、九個月內，國內聞人，海外華僑和國際著名人士發起救援運動，向政府當局致送函電，請求從寬處理，即予釋放。一時，「

七君子」在民衆的心目中成爲了民族英雄，愛國志士。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，從此點燃了抗日戰爭的烽火。由於抗戰爆發，國內外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，全國團結抗戰的局面已經完成，七月三十一日，江蘇省高等法院裁定具保釋放。沈鈞儒由張一鷹具保、章乃器由李根源具保、王造時由陶家瑤具保、李公樸由陸翹雙具保、鄒韜奮由張一鵬具保、史良由潘經報具保、沙千里由錢粹楚具保，予以釋放。

參予五四愛國運動

「七君子」中最年輕的「君子」王造時，小時叫王雄生，一九〇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生於江西省安福縣。其父王子泉是一個木排工人，替人從山上伐下木頭，然後沿江放送木排，後來積蓄了點錢，做起竹木生意。王造時出生之後家境小康。王家與開雜貨店的朱家是世交，王造時小時父母便替他與朱家女孩朱透芳訂了親。一九一七

年秋，王造時考上了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。一九一九年的「五·四」運動中，王造時才十六歲，是清華學校中等二年級級長，他積極地

參予了「五·四」的愛國運動。六月三日，王造時在北京東安市場講演時被捕，關了五天被釋放了。這一年暑假他沒有回老家，依然在北京參加學生運動，八月二十八日，他參加了北京學生代表團，向大總統徐世昌請願，又一次被捕入獄，但只關了一天就釋放了。

經過八年學習，王造時於一九二五年在清華留美預備學校畢業，轉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求學，在四年留學期間，他先後取得了學士、碩士和博士的學位。一九二八年秋，朱透芳也以自費留學美國，他們兩人在威斯康辛州首府麥迪遜結了婚。婚後王造時又到英國倫敦大學，師從當時在國際政治學界享有盛譽的拉斯基教授學政治。

學成歸國風華正茂

一九三〇年秋，王造時學成歸國，他甫抵國門，上海光華大學和中國公學便聘請他爲教授，光華大學還聘請他擔任文學院院長兼政治系主任，這時，王造時年僅二十七歲，可謂青年得志，風華正茂。羅隆基、彭文應、彭學沛和王造時都是江西安福人，又都是清華學生，同是留美歸來

人稱「安福四才子」，而羅隆基、王造時和彭文應又被稱為「安福三杰」。那時，羅隆基任「新月」雜誌編輯，便向王造時約稿，他便為「新月」寫了一篇「從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」的文稿，因而開罪了當時的權貴。當局追究責任，鬧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。一九三二年，王造時自己主編了一本叫做「主張與批評」的雜誌，由於他敢於針砭時弊，這本雜誌只出了三期又被查封了。一個半月後，王造時主編的一本名為「自由言論」的雜誌又出現在上海街頭，但不到一年，「自由言論」又被勒令停刊。刊物不能辦了，王造時就將他在這一時期撰寫的那幾十篇詞鋒犀利，態度鮮明的愛國政論集編印出版，並為這部集子取了一個具有諷刺味道的名字「荒謬集」。

幾年來，王造時由於發表了一系列不合時宜的言論，成了有「共產嫌疑」人物，遭到當局密令各大學不許聘用他執教，王造時迫於生活，只得於一九三三年八月起改行去做律師，直到共產黨在大陸建立政府為止。

斯人憔悴流落上海

由於「七君子」與共產黨的淵源關係，所以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建政以後，「七君子」之中，除了鄒韜奮、李公樸兩人去世以外，其餘四位「君子」都陸續從上海調往北京，沈鈞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，章乃器任糧食部部長，史良任司法部部長，沙千里任商業部部長。只有王造時掛了一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的虛銜，失業於上海，所以他的老同學潘大逵曾引用杜甫的詩句「冠蓋滿京

華，斯人獨憔悴」來調侃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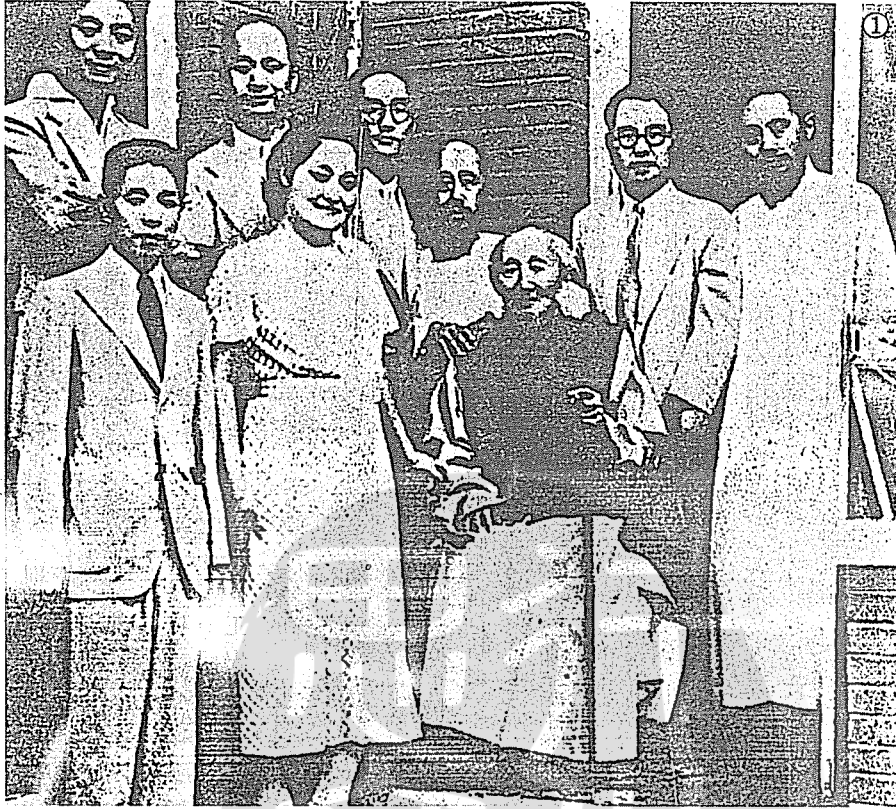
為什麼「七君子」其他人都能飛上枝頭作鳳凰，而惟有王造時「獨憔悴」呢？原來是因為日本和蘇聯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後，救國會曾寫了一封致史大林的信所致。一九四一年，蘇聯和日本簽訂了一個互不侵犯條約，聲稱「締約國雙方保證維持相互之間和平與友好邦交，互相尊重對方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。」這個條約還附了一份宣言，聲稱「蘇聯誓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。」當時正當日本帝國主義進犯我國，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發表後，輿論嘩然。重慶救國會的負責人開會討論這件事，認為救國會是於日本侵略東北而發起的，中國抗戰是由於日本的侵略，蘇聯雖然是個友好國家，但是和日本簽訂這個條約對中國是個打擊。於是眾人就推選王造時起草一封致史大林的公開信，表示這個條約是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主權的完整。這封信由張申府審查後，又經開會修正通過，當時除鄒韜奮在香港外，其餘六「君子」都在重慶參加了會議。會議決定由沙千里繕寫兩份，次日沈鈞儒、史良、李公樸、沙千里、王造時、張申府、劉清揚、胡子嬰等九人集合在史良家中簽字後發出。後來有人竟說那封信是王造時先起草，然後又強迫大家簽字發出的。當年「反蘇」、「反共」、「反史大林」就是意味著「反革命」，就是「大逆不道」。所以別人都赴京走馬上任去了，只有王造時還流落在上海，從一九四九年五月起，至一九五一年夏都一直無所事事，負債累累，生活困難。直至一九五一年夏，當時復旦大學校長

陳望道親自到王造時家中，邀請他到復旦大學任教，才算有了一個工作。

寫信向周恩來求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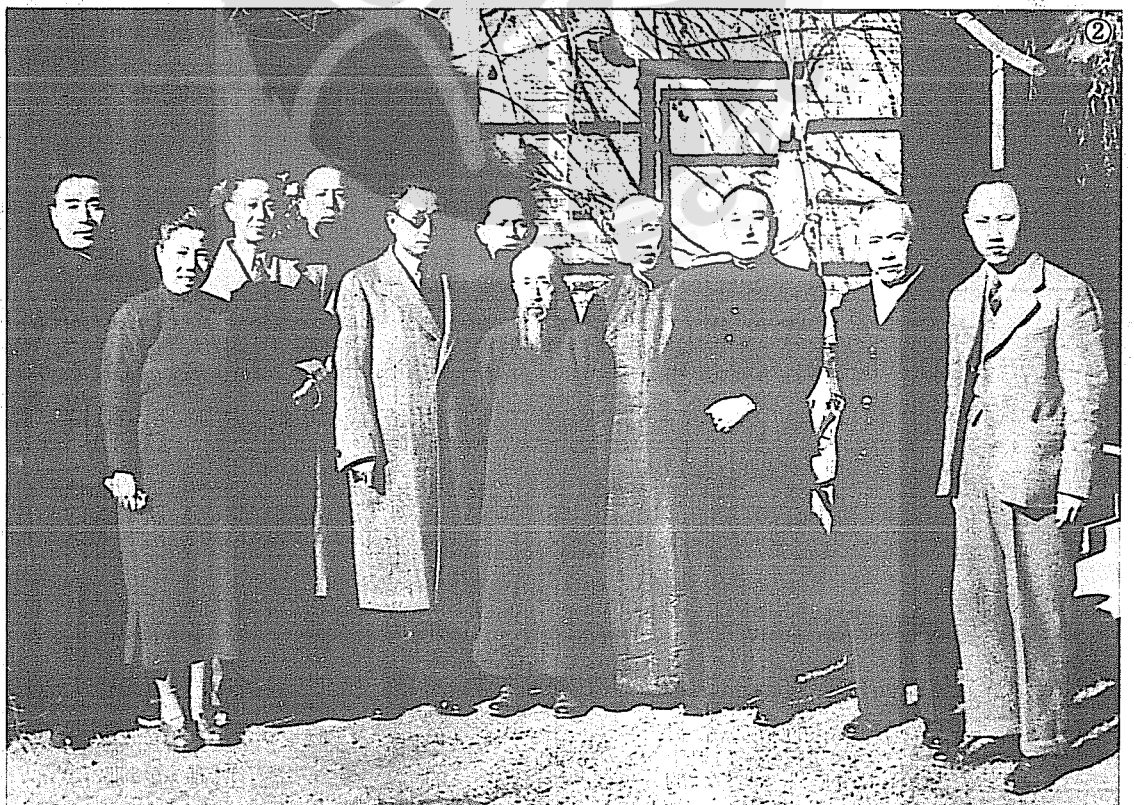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五七年三月，政治協商會議二屆三次全委會在北平舉行，周恩來在會場上見到王造時，並約他談話。三月二十七日傍晚，周恩來與王造時推心置腹地促膝談心，他們談到了那封使王造時蒙受「反蘇」、「反共」罪名的信，消除了多年來的誤會，使王造時放下了沉重包袱。六月十二日早晨，他給周恩來寫了一封感謝知遇之恩的信。不料就在這一天，他便被作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被批鬥了。一連數天的批鬥，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，右派分子王造時的反動之論也見諸報端。

在這艱難的時刻，王造時於六月二十二日又寫了一封信，向周恩來求救：「多年以來，由於家庭迭遭不幸事故，加以自黨對我有薄膜存在，故一向緘默，不敢有所獻議，誠恐言或失當，於公於私都無好處。本年三月間在京得有有機緣同統戰部及救國會諸友暢談之後，相與澄清一些歷史上的問題。復蒙我公召見懇談，猥承勉勵，精神為之一奮，私衷自矢，今後對黨對社會主義，更應竭忠盡慮，以圖報答。適值黨大力號召鳴放，廣開言路，我鑒於官僚主義相當普遍，激於愛黨愛國之情，感於「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」之旨，深受鼓舞之下，遂破除顧慮，放膽為言。殊不料由於對政策的體會不夠，對社會主義的觀察不周，所發生的客觀效果徒加



② 周恩來（左）文化大革命時對王造時愛莫能助。圖為周恩來與沈鈞儒（前排中）等民主人士合影。

① 不分前後排右二起：王造時、馬相伯、沈鈞儒、鄒韜奮、史良、章乃器、杜重遠、沙千里合影，右一為李公樸。



了黨和政府的困難，造成了不良的影響，此雖非始願所及，但後果責任應由我來負。以惟恐天下不治之心，招致唯恐天下不亂之謂，我不僅愧對黨國，愧對我公，抑且愧對自己。我將嚴肅認真，實事求是地作一書面檢查，以冀彌補損害於萬一。但若強我承認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人物，則違心之言，我所不為，恐於社會主義的建設亦無裨益也。

「承您關懷備至，我當此疑難，心懷又不免嚮往您處。誠知您正在開人民代表大會，原無暇晷處理瑣事，但向日之葵，仍期一照，不知可否由您斟酌通知上海市委或正在京參加人代會的劉述周部長，由此間負責同志約我面談，指示對我的要求，使我能夠認識問題的所在，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，做好書面檢查，糾正不良影響，同時不強我作言不由衷之論。如果您認為我當面聆教更為妥當，我亦可隨時入京趨謁。」

「我的長兄長期患精神病於上海醫院，幼兒初患精神病於南京醫院，長女神經曾受刺激在家休養，而愛人則已於去年三月中旬逝世，我個人亦有血壓增高及風濕之病，自顧孑然一身，原無所求。如能以殘餘年華追隨黨及毛主席和我公之後，作一磚一瓦之用，而有助於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，誠衷心所祝，殊不願抑鬱因死，徒負你臨別相期的至意。」

誠惶誠恐，懇切陳詞，王造時嘔心瀝血的自我剖白的哀鳴，這與當年「從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」、「國民黨怎麼辦？」、「安內必先攘外——為政府進一忠言」等言詞鋒利，慷慨激昂的政治

論比較起來，前者是橫眉冷對，擲地有聲；後者則是俯首陳詞，甚至是搖尾乞憐，真為生活在這個社會制度下的知識份子掬同情之淚，感到無奈和悲哀。

錚錚鐵漢悲慘下場

王造時不但在政治上遭到打擊，同時也陷入家庭的不幸之中，他的子女受到精神的折磨，長子王鈞陶、長女王海若、次子王鈞樞都先後患了精神病。子女的醫療費用成了王造時沉重的經濟負擔，政治上的打擊又成了王造時的精神枷鎖，使他陷於精神崩潰的邊緣，正如他自己所說的，「書則徘徊一室之中，夜則輾轉布榻之上，痛定思痛，苦求有所以自拔。」

王造時被打成右派以後，降職降薪，被剝奪了講課的權利，下放到復旦大學圖書館，他的住所也被從設備較好的茂名公寓中趕出，遷到北川公寓去住。與此同時，小女兒王海容因為同情父親的不幸，遭到株連，也被打成右派份子，下放到復旦大學玻璃廠做雜工。

一九三六年十一月，王造時因救國會案被捕入獄，整整三十年後的一九六六年十一月，王造時又被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押入上海第一看守所。王造時對這座監獄很熟悉，幾年前，他曾多次以律師的身分來過這裡辦案，而今天卻在這裡成了階下囚，歷史是多麼殘酷無情。

「文化大革命」是一個瘋狂的年代，人事變幻就像走馬燈一樣，王造時被押進看守所不久，

負責審理他的案子的人也被捕了，從此他就成爲一個無人審理的人，一直到他死去，再沒有人叫他做「王造時」，他的名字就被囚號「一四一六」所代替。直到一九七一年，原先負責審理他那個公安人員出獄，重新出來工作了，當他查看在押犯人名單時，赫然發現王造時還名列其中，他來到囚室察看，王造時已因患肝腎綜合症被送往醫院了，此時此刻，他氣息奄奄，生命垂危，戴著手銬躺在病床上，幾天後，他便與世長辭了，終年六十八歲。

當年王造時沒有死於國民政府江蘇高等法院看守所，現在卻戴著手銬喪生於共產黨統治下的上海第一看守所，又是一個莫大的諷刺。

次年，王造時五個子女中唯一在世的小女兒王海容，在政治高壓下又患上乳癌，不治去世，就這樣，王造時一家，除了他的續弦妻子鄭毓秀仍然健在之外，其餘的都不在人世了。

當年的錚錚鐵漢，正人君子，人們心目中的愛國志士，竟然到如此悲慘的下場。他的名字，曾經受到萬人景仰，載入了中國現代史，載入了「世界名人錄」，然而，在他那非常簡陋的墓碑上，卻竟然找不到他的名字，只寫上鮮為人知的小名——王雄生。

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、缺頁、污損，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。